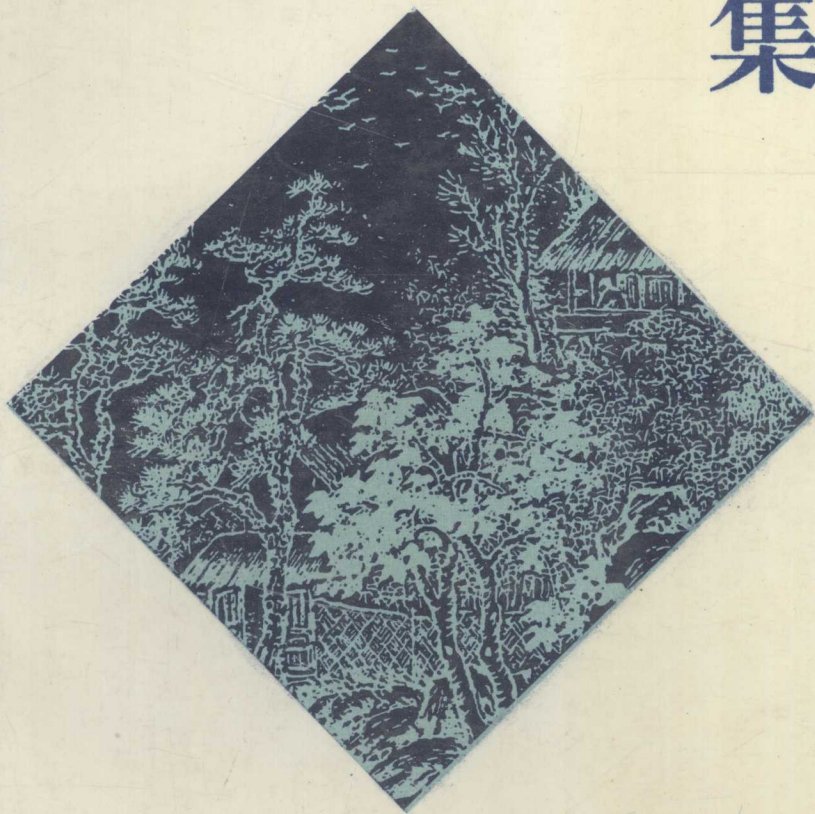


阳明学研究丛书

主编 吴雁南

刘宗碧
龙连荣
王雄夫
点校

孙应鳌文集



贵州教育出版社

孙应鳌文集

刘宗碧 王雄夫 点校

贵州教育出版社



阳明学研究丛书

孙应鳌文集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80 千字

印数：1—1,120 册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83—756—2/G·750

定价：68.00 元（套）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

阳明学产生于明代中叶。其奠基人王阳明，从少年时代起就立下欲做圣贤之志，开始了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奋斗不息，成为封建社会的全才，以在立德、立功、立言等三个方面都有建树而闻名于世。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明正德三年（1508年）的“龙场悟道”，成为他创建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的起点，正德十六年（1521年）“致良知”之说的揭示，则标志其学说臻于完善。阳明学的体系，与朱熹理学以理为中心不同，是以心为本体，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致良知”等理论构筑而成。王氏在创建其学说的起点——龙场悟道时，即以昂扬人的主体意识为旗帜，宣称“吾性自足”。其后，又提出，不论贫富贵贱、贤愚不肖均可以为圣人。他所谓的“人者，天地之心”^①即认为：天地之中，人是最尊贵的。声称：人的良知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古往今来的事事物物、思想主张、理论教条，都应受良知的审视。他又说：“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②王氏笔下的圣人，实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超人”。这种超人以我之良知的是非为是非，“扩大公

① 《亲民堂记》。《王阳明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五一页。

② 《答友人》。《王阳明全集》卷六，第二〇七页。

无我之仁”，“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王氏在论著中反复强调：“圣贤只是为己之学”，^①所谓“为己”，即是学习的着力与出发点在于修身、完善自我，执著地追寻一种至善的境界和社会理想；一旦达到“我”所理想的境界，则“天下皆归于吾”矣。就此而论，王氏的人生哲学的逻辑则为：“我——克私为公——我”，即以“我”为出发点、为归宿点。这种以个人为中心或至上的“超人”观又是与他的“凡人”观，即“满街圣人”、“人人心中都有圣人”联结在一起的。圣人、超人、凡人相结合的以个人为中心或至上主义者，在王氏的笔下，虽然还受封建伦常的束缚，尚未突破“存理灭欲”的藩篱；但按其理论发展的逻辑：既然，一切思想主张、理论教条，都须提到超人的良知的审判台，那么，这种以个人为中心或至上的超人，必然力图冲破网罗，力破传统。如果把它同王门后学王艮、李贽以及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陈确等一批学者的思想主张联系起来研究，这一势头是非常明显的。王氏的这种超人观，大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人们对人道的追寻。

应当指出：王氏的这种圣人、超人、凡人相结合的以个人为中心或至上的思想，既有别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又与尼采的超人哲学大相径庭，它是以仁相标尚，倡言“大公无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寻求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为终极目的的。阳明学派巨子大都继承了这一精神。

王阳明作为一代儒学大师、政治家、教育家，其学说充满忧患意识。为了“匡国”济世，他创“知行合一”说，以为“对病的药”，^②颇具有经世致用精神。明朝人称赞王氏“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③其后学亦多发扬其实学精神，崇实致用，即使

① 以上均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一一〇页。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第五页。

③ 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阳明全集》卷四，第一五六二页。

是被人们目为狂放的李贽等辈学人，亦多以“经世”相标尚。及至明清之际，“崇实黜虚”、“经世致用”，更在阳明学派巨子中达成共识，并成为当世社会思潮的一种大趋势。人们在苦心积虑地探索经邦济世、改革中国的新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追寻一种尽人道之极的理想社会。王阳明出，亦以“三代王道之治世”和大同理想社会相标尚，企图建立一种和谐、相爱的小康社会，并进而建立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表现出一种对天下国家、对人类的强烈责任感，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强烈愿望。

王阳明的学说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大变革的情况下适应时代需要产生的。它的许多命题，在儒学内部都具有革新倾向，具有开放性。又由于当时社会的新因素尚处于萌芽之中，旧的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各个领域还居于绝对优势。王阳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其思想主张虽具有进步与革新因素，却是充满矛盾的，呈现突出的两重性：欲突破传统，又囿于传统。他的论说，不乏平等的思想因素：认为人人天赋的良知是平等的，“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①当其学生称颂他说：“先生譬如泰山在前”，王氏即表示：“泰山不如平地大”，^②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却又认为，维护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是不可动摇的，甚至说：“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③应当看到他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王氏的思想主张，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政治、哲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王氏自“龙场悟道”以后，始终讲学不辍，弟子广布天下，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派。阳明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说。王阳明去世以后，以他为宗师的思想流派，竞相阐发师说，有的恪守师说，有的“愚岩撒手”，无所羁络，随

① 《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一〇七页。

② 以上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③ 《万松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七，第二五三页。

着星移斗转，适应形势之变化，发展和演变阳明之学。王门后学对王氏的思想主张所阐发的理论观点，是否属于阳明学的范畴呢？我个人的意见是肯定的。正如中国儒学创自春秋时代的孔子，此后两千多年间，其学说一再为后儒所推演发展，而儒学之名称却未尝变易。显而易见，王阳明作为阳明学的奠基人，其学说无疑是阳明学的基础；而阳明学亦应包括继其统系的思想主张在内。果如是，则清初三太儒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及陈确、毛奇龄、唐甄等的思想主张，均属于阳明学的范畴，并对阳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这种发展也包括阳明学派内部的论争、批判，特别是这个学派的自我反思、总结和自我批判。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明代中叶，长江流域一带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叶以后到清初近二百年间，也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特别是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的时局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亦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思想的斗争、发展和演变。王阳明正处于这一社会大变局的开端，阳明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也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变局、大动荡的历史时代。而阳明学派巨子之所以能够逐渐透过封建正统思想的重重迷雾，抒发一些民主性的思想主张，是同上述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作为阳明学奠基人的王阳明，虽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是明末清初阳明学派学者的许多启蒙思想主张，却可从他那里找到源头，其在近世思想启蒙的历史长河中的启迪之功，是不可低估的。

阳明学作为中国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虽在清初已基本上终结，但它的影响力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越时空的。阳明学的影响，不仅在中国经久不衰，而且在亚洲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及于欧美的一些地区，随着时日的增长，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地区的人们所瞩目。

对阳明学的研究，贵州学术界有着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因为贵州是阳明学的发端之地。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贵州学术界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阳明学，特别是对贵州王门后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涌现出一批阳明学研究者 and 爱好者，成立了一些阳明学研究团体和机构。为了对阳明学的研究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在贵州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决定编写《阳明学研究丛书》，向即将在我省举办的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献礼。第一批“丛书”包括两大类内容：一种为有关阳明学的论著；一种属于史料文献方面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以便给研究者提供一些方便条件。

阳明学内容非常丰富庞杂，其既要突破传统，又囿于传统。其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杂有不同程度的糟粕。因而必须坚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发扬其积极因素，又要摒弃其消极因素，为繁荣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努力。

阳明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还将对人类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关心、支持对阳明学的研究，必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热诚希望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同我们一起做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吴雁南

1996年3月1日

序

常 征

孙应鳌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王阳明后学在贵州的杰出代表。《孙应鳌文集》的点校、出版，是我省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对研究心学大师王阳明学说的历史发展和影响，对宣传贵州、提高贵州的知名度，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研究王阳明和他的学说，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一个热门课题。王阳明本名守仁，字伯安，阳明是他的号。浙江余姚人，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任兵部主事，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得罪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被刘瑾矫旨迫害，“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境）当了小小的驿丞。王阳明历尽艰险，吃够苦头，于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到达贵州龙场。他身处逆境，备受煎熬，却没有磨灭意志，消沉无为；相反，他更加勤奋读书，刻苦钻研，潜心治学，孜孜以求，终于达到了“悟道”的境界。他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陆象山的“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著名理论，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陆王学派。阳明学说在当时和以后，在国内和国外，特别是在日本、韩国等国，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王阳明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封建社会堪称“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均有突出建树的全才。王

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在贵阳等地“传道”，贵州从学弟子与日俱增。他离开贵州之后，坚持为官与为学相结合，到处兴教育，办书院，不遗余力地深钻广传自己的学说。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学说更是哄动全国、盛极一时，学习、研究、传播者遍布各地，且涌现了许多造诣很深的学者名流。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贵州的王门后学亦开始形成，主要有：贵阳的马廷锡，清平的孙应鳌，思南的李渭，都匀的陈尚象等，分别在黔中、黔东南、黔东、黔南讲学。其中成就最大、声名最高、著述最丰者当推孙应鳌。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生于1527年（即王阳明逝世前二年），逝于1586年。孙应鳌生活的年代，正是明嘉靖、万历年代，也即阳明学说风靡全国的极盛时期。孙应鳌接受阳明学说的影响，是从19岁受学于王阳明再传弟子徐樾开始的。徐樾，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王学名家，1544年（嘉靖23年）继王学另一传人蒋信之后到贵州任提学副使。他一边做官，一边热心讲授阳明心学，成效显著，从者如流，孙应鳌便是其中之一，且是他最器重、最得意的门生。孙应鳌自幼聪慧好学，27岁中进士，随后在北京、江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做官，广泛结交各地王门后学，互相切磋、探讨、交流研究心得，心学根底益深益厚益趋成熟。经过数十年之精心探索，终于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就，成为与当时罗近溪、赵大洲、胡庐山等心学名流并驾齐驱的心学家，被称为“名臣大儒”，享誉天下。

孙应鳌潜心研究、积极传播心学，一生写了很多著作。据贵州师范大学刘宗碧教授介绍，见于《明史·艺文志》所记的有：《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淮海易谈》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汇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四库著录》中少《论学汇编》和《庄义要删》两种）见于郭子章的《理学传》和

《千顷堂书目》的复有：《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教秦语录》、《雍论》、《学孔精舍续稿》、《道林先生粹言》等。遗憾的是，孙应鳌逝世后，没有人专门系统搜集、整理、刊行他的著作，加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他的著述散失、损毁严重。直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幸有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四处寻访、搜集整理，得孙著六种三十卷，并由其弟莫祥芝于光绪庚辰年（1880年）刊印成《孙文恭公遗书》，才使孙应鳌多数重要著作得以重新问世。光绪年间，贵州遵义学者黎庶昌出使日本，偶然在日本友人处发现散失多年的《孙山甫督学文集》，回国后予以刊印，孙应鳌的著作因之初步具备了原来的大体面貌。清宣统庚戌年（1910年），孙应鳌后裔孙回澜先生亦在南洋官书局刊行了《孙文恭公遗书》。民国壬戌年（1922年），贵州刊印的《黔南丛书》中也有《淮海易谈》四卷。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孙应鳌文集》是刘宗碧教授主持，约请黔东南民族师专副教授龙连荣、王雄夫合作，在他们原来合作点校并由黔东南州志办作内部书刊印行的《孙应鳌文集》的基础上完成点校的，最后复核由刘教授承担。这部点校《孙应鳌文集》以莫氏兄弟刊印的《孙文恭公遗书》为底本，与南洋官书局本相对照参校，同时结合参考了《黔南丛书》、《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宋儒学案》、《明儒学案》有关内容。应当说，在现有条件下，做得是比较圆满、比较完善了。

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点校、出版《孙应鳌文集》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理应积极支持。贵州学术界、出版界，责无旁贷地应该主动承担整理、点校、注释、出版贵州历史上学者名家著述的任务。相信有眼光、有远见的人们都会同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做好这件事，关系重大，功德无量，应该努力为之，不可漠然视之。否则，倒真有点放松责任、疏于事业的味道的味道，对先辈、对今人、对后代都是不好交代的。特别是对像

孙应鳌这样成就高、影响大、著述多而又损失严重的学问家，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他们的著述带有抢救性质，更应该争取时间、积极去做。所以，《孙应鳌文集》的点校出版，无疑是一个贡献。

刘宗碧和龙连荣、王雄夫同志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和由这份心血浇灌出来的科学成果，这里应该向他们致敬致谢！贵州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大力支持点校《孙应鳌文集》的出版问世，亦应向他们衷心地致意！刘教授他们热诚邀我为之写序，我欣然从命，目的在于感谢刘教授他们在学术园地的辛勤耕耘，祝贺他们研究成果的出版问世，同时，更寄厚望于贵州学术界、出版界，为贵州学术的日益繁荣昌盛鼓与呼。热切期待贵州涌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成果！

内 容 简 介

本书整理、点校了明末贵州心学家孙应鳌的四种有代表性的著作，为读者研究贵州阳明后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淮海易谈》是作者用心学观点研究阐发《周易》的专著，书中体现了作者“心为太极”、“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的心学世界观和“尚变”、“时中”、“一分为二”、“合二以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四书近语》是作者用心学观点解释阐发儒学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专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心性本体论、格致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和诚敬、慎独的修持观。

《教秦绪言》是作者为关中学子立下的教条，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幽心瑶草》是作者对贵州清平“学孔精舍”学子的勉励和训导，反映了他有关论心、论学的基本观点。

点校说明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卒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贵州清平人（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县炉山镇）。孙应鳌生活于王门后学风靡全国之际。18岁受学于阳明弟子徐樾，接受心学影响。通籍以后，在江西、陕西、四川、湖北、北京等地做官，又遍交阳明弟子和再传弟子蒋道林、罗念庵、胡庐山、邹颖泉、罗近溪、赵大洲、耿在伦、耿楚侗、王敬所等心学名儒，相互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心学功夫日愈精进，终于成为贵州乃至全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学者以孙应鳌、赵大洲、胡庐山、罗近溪并称，有“名满天下”之誉。

贵州的阳明后学，以孙应鳌为主要代表。他在做官和乞身在告期间，写了许多著作，见于《明史·艺文志》的有：《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淮海易说》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汇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在明末郭子章的《理学传》和毛在《遗稿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有：《四书近语》六卷、《左粹题评》十二卷、《教秦语录》一卷、《春秋节要》、《学孔精舍续稿》、《道林先生粹言》等书目。清初的《四库著录》中，已少《论学汇编》和《庄义要删》两种。以上著作虽有书名，但内容大多散失。迨至清道光、咸丰年间，贵州独山学者莫友芝先生，尽

毕生精力搜集孙应鳌遗书，经数十年努力，使失散多年的孙应鳌著作初步“完璧”。光绪庚辰（1880年），莫友芝先生之弟莫祥芝先生，将其兄搜得的孙应鳌著作刻版问世，名为《孙文恭公遗书》。清光绪年间，贵州遵义学者黎庶昌先生出任日本国公使，在日本国学博士中村正直家发现失传多年的孙应鳌《督学文集》，取回后，刊入《黎氏家集》中。宣统庚戌（1910年），孙应鳌的族裔孙回澜先生，在南洋官书局铅印莫氏刻印的《孙文恭公遗书》中增补了黎庶昌搜集的《督学文集》和一些散篇，是为孙应鳌著作最全的本子。民国壬戌（1922年），贵州刻印《黔南丛书》，也刊载了《淮海易谈》四卷。

1985年，贵州高等学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决定整理、点校《孙应鳌文集》，并责成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教师刘宗碧和黔东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教师龙连荣、王雄夫进行具体工作。在整理中，筛选出《淮海易谈》四卷、《四书近语》六卷、《教秦绪言》一卷、《幽心瑶草》一卷，经过认真校勘，编成《孙应鳌文集》。《淮海易谈》四卷，由刘宗碧点校；《四书近语》六卷、《教秦绪言》、《幽心瑶草》由龙连荣、王雄夫点校。1990年底，点校完成，由黔东南州志办以内部书刊形式出版。1995年底，贵州教育出版社为了迎接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召开，决定出版《阳明学研究丛书》，贵州阳明后学的杰出代表孙应鳌的文集列入其中。

《孙应鳌文集》，在原黔东南州志办内部书刊的基础上，由刘宗碧、龙连荣、王雄夫三人分别复查，综合有关专家的意见，由刘宗碧作全书统一校订工作。

以次校勘《孙应鳌文集》，以清光绪庚辰莫氏本为底本，与清宣统庚戌南洋官书局本相互参校，并参考了《黔南丛书》、《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宋儒学案》、《明儒学案》等有关资料。

为了查阅方便，仿照杨伯峻先生《论语评注》的办法，在

《淮海易谈》和《四书近语》两部多卷本中，每一自然段前加上数字编号。凡在“·”前的数字表示卷数，“·”后的数字表示自然段数。如“1·1”，即卷一第一段。《教秦绪言》和《幽心瑶草》因篇幅少，未加数字编号。

《文集》的校注，一律采用篇末注的办法。在莫氏本中，原夹有莫友芝先生和莫祥芝先生的注，用小号字体与正文区别。此次为了统一体例，将二莫之注移到篇末，特此说明。

此次《孙应鳌文集》出版，先是得到贵州省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贵州省教委高教处、贵州省社联、贵州省哲学学会、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贵州省黔东南州社科联、黔东南州志办的大力支持，继而又得到贵州教育出版社的鼎力促成。在此，对支持过本书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深切谢意。

由于点校者水平有限，点校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行家批评指正。

目 录

一、淮海易谈（四卷）

尚书文恭孙应鳌传（郭子章）	(2)
孙文恭公小传（莫友芝）	(5)
淮海易谈自序	(10)
卷一（1·1—1·89）	(12)
卷二（2·1—2·84）	(49)
卷三（3·1—3·65）	(84)
卷四（4·1—4·101）	(119)

二、四书近语（六卷）

四书近语序（王耘）	(159)
四书近语序（戴嗣方）	(161)
重刻《四书近语》序（戴嗣方）	(163)
四书近语自序	(164)
卷一（1·1—1·20）	(165)
卷二（2·1—2·48）	(172)
卷三（3·1—3·128）	(187)
卷四（4·1—4·141）	(211)
卷五（5·1—5·271）	(242)